**刘宗周 摘录**

1578年正月二十六（3月4日）今年是其诞辰440周年

**1645**年闰六月初八 绝食二十三日而死 68岁

遗腹子，为纪念未及见面的父亲，别号**念台**。

因后迁居山阴城北蕺山下，讲学15年，所以称**蕺山**先生。

南明鲁王谥称忠端，唐王谥称忠正，清乾隆四十年，又谥称忠介。

万历、天启、崇祯

“宋明儒学最后之大师”（唐君毅语）；“**宋明理学的殿军**”（牟宗三语）；“中国17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”（杜维明语）。

宋明儒学中最后一个学派——蕺山学派

被时人称为“明季二大儒”之一

牟宗三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》最后一段：

**明亡，蕺山绝食而死，此学亦随而音歇响绝。此后，中国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即陷于劫运，直劫至今日而犹未已。噫!亦可伤矣！**

据《年谱》记载，宗周“通籍（做官）四十五年，**在仕仅六年有半，实立朝者四年**。”

一生中经历三次革职：天启四年（1624）、崇祯九年（1638）、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。

刘宗周与浙东学派

何炳松《浙东学派溯源》自序：

**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，实以程颐为先导**。程氏学说本以无妄与怀疑为主，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最为相近。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，多识前言往行，并实行所知，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。传其学者多为浙东人。故程氏虽非浙人，而浙学实渊源于程氏。**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己、郑伯熊，及金华之吕祖谦、陈亮等，实创浙东永嘉、金华两派之史学，即朱熹所目为“功利之学”者也。金华一派，又由吕祖谦传入宁波而有王应麟、胡三省等史家之辈出，金华本支则曾因由史入文，现中衰之象；至明初宋濂、王祎、方孝孺诸人出，一时乃为之复振。唯浙学之初兴也，盖由经入史，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入文。**故浙东史学自南宋以至明初，即因经史文之转变而日就衰落。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。

**适明代末年，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，“左袒非朱，右袒非陆，”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，实远绍程氏之无妄，遂开浙东史学中兴之新局。**故刘宗周在吾国史学史上之地位，实与程颐同为由经入史之开山。**其门人黄宗羲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，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、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、章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。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，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，**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，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，实足竞爽。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。

**唯浙东史学第一期之初盛也，其途径乃由经而史，及其衰也乃由史而文。第二期演化之经过亦复如是。**今人之以文学眼光估计全氏之《宋元学案》及章氏之《文史通义》者，不一其人，即其明证。此殆因吾国史籍过于繁重，科学方法又未盛行，遂致研究历史者或陈陈相因不能有所发明，或避重就轻退而专意于文学。浙东史学之盛极难继，盖非偶然矣。

**刘宗周的性格、性情**

刘汋《年谱》下：“先君子**盛年用工，过于严毅。平居斋庄端肃，见之者不寒而栗。及晚年，造履益醇，涵养益粹**，又如坐春风中，不觉浃于肌肤之深也。”（）

黄宗羲《行状》：“先生宗旨为慎独。始从主敬入门，中年专用慎独工夫。慎则敬，敬则诚。晚年愈精微愈平实，本体只是些子，工夫只是些子。仍不分此为本体，彼为工夫。亦并无这些子可指，合于无声无臭之本然。**从严毅清苦之中，发为光风霁月**，消息动静，步步实历而见。”

**刘宗周的思想演变**

邵廷采：“伏见郡城蕺山刘先生者，性成忠孝，学述孔曾。立朝则犯颜直谏，临难则仗节死义，真清真介，乃狷乃狂。洎乎晚年，诣力精邃，揭慎独之旨，养未发之中，刷理不爽秋毫，论事必根于诚意。**固晦庵之嫡嗣，亦新建之功臣**。若其正命而终，犹见全归之善，死非伤勇，何从慷慨。”

（邵廷采，师承黄宗羲，幼读刘宗周《人谱》，服膺王学。）

黄宗羲《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》：“有明学术，白沙开其端，至姚江而始大明……**逮及先师蕺山，学术流弊救正殆尽。向无姚江，则学脉中绝；向无蕺山，则流弊充塞。**凡海内之知学者，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。今忘其衣被之功，徒訾其流弊之失，无乃刻乎？”

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：“凡一个有价值的学派，已经成立而且风行，断无骤然消灭之理，但到了末流，流弊当然相缘而生。继起的人，往往对于该学派内容有所修正，给他一种新生命，然后可以维持于不敝。王学在万历、天启间，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。**东林领袖顾泾阳宪成、高景逸攀龙提倡格物，以救空谈之弊，算是第一次修正。刘蕺山宗周晚出，提倡慎独，以救放纵之弊，算是第二次修正。明清嬗代之际，王门下唯蕺山一派独盛，学风已渐趋健实。**清初讲学大师，中州有孙夏峰，关中有李二曲，东南则黄梨洲。三人皆聚集生徒，开堂讲道，其形式与中晚明学者无别。所讲之学，大端皆宗阳明，而各有所修正。三先生在当时学界各占一部分势力，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。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，其派复衍为二：一为史学，二即王学。而稍晚起者有江右之李穆堂，则王学最后一健将也。今本讲以梨洲为中坚，先以夏峰、二曲，而浙东诸儒及穆堂附焉。清代阳明学之流风余韵，略具于是矣。”

王学到了明代万历、天启之后，流弊已经大显，而宗周自此走上为学之途，平生所为，皆扭转王学末流之弊，拴住脱缰后的王门心学。

宗周之后，黄梨洲还能传乃师之学，而能“守住心性之学的阵脚”（刘述先语）

黄宗羲《子刘子行状》：

“**先生宗旨为慎独。始从主敬入门，中年专用慎独工夫。慎则敬，敬则诚。**晚年愈精微愈平实，本体只是些子，工夫只是些子。仍不分此为本体，彼为工夫。亦并无这些子可指，合于无声无臭之本然。**从严毅清苦之中，发为光风霁月**，消息动静，步步实历而见。”

“**先生于新建之学凡三变：始而疑，中而信，终而辩难不遗余力，而新建之旨复显。**”

最后一句话最有意思，晚年的蕺山对王学辩难不遗余力，但用这样的方式 ，反而能够使阳明的精神复显 。

董瑒（门人）：“**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，始疑之、中信之、终而辨难不遗余力。**始疑之，以其近禅也；中信之，信其为圣学也；终而辨难不遗余力，谓其言良知，以《孟子》合《大学》，专在念起念灭用工夫，而于知止一关全未堪入，失之粗且浅也。夫惟有所疑然后有所信；**夫惟信之笃，故辨之切，而世之竞以玄妙称阳明者，乌足以知阳明也哉？**”

此一对王学由疑而信而批评，乃至修正的过程，正与其逐渐形成起自己以慎独为宗旨的心学思想体系，并因之而成为独具个性的儒学宗师的过程相符应。

刘宗周自己的思想变化：始于主敬，中用慎独，晚归诚意。与阳明学的关系：始疑，中信，终而辩难。

宗周早年不喜欢王门后学，其学问起始于程朱，此亦如阳明早年一样。

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，**37岁。甲寅悟心**。悟天下无心外之理，无心外之学，著《心论》。

天启五年（1625），**48岁。始有慎独之说**。

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**50岁。阅读明代诸儒文献**，编成《皇明道统录》，对世推大儒如薛敬轩、陈白沙、罗念庵、王龙溪等，皆有贬辞，“**通录中无闲辞者**，自逊志（方孝孺）、康斋（吴与弼）外，又有曹月川（曹端）、胡敬斋（居仁）、陈克庵（选）、蔡虚斋（清）、**王阳明**、吕泾野（柟）六先生。”

正是在著辑此书过程中，宗周“读阳明文集，始信之不疑，为论次曰：‘**先生承绝学于辞章训诂之后，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，曰良知；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，曰致良知。良知为知，见知不囿于闻见；致良知为行，见行不滞于方隅。即知即行，即心即物，即静即动，即体即用，即工夫即本体、即上即下，无之不一，以救学者支离眩鹜之病，可谓震霆启寐、烈耀破迷，自孔孟以来，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。**”（《年谱》天启七年条，亦可参《明儒学案·师说》）

刘宗周在读了阳明的书后，对阳明学说推崇备至。

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，61岁，删定《阳明先生传信录》，花费很大精神从阳明文集、语录中摘录有关说明“良知即天理”、“致良知只是存天理之本”和慎独即是致良知的文字。

崇祯十二年，62岁，《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》。

**诚意、慎独**

刘汋《先君蕺山先生年谱》：“先君子之学圣人之诚者也，始致力于主敬，**中操功于慎独，而晚归本于诚意。**”

黄宗羲《明儒学案·蕺山学案》：“**先生之学，以慎独为宗，儒者人人言慎独，唯先生始得其真。**……学者但证得性体分明，而以时保之，即是慎矣。慎之工夫，只在主宰上，觉有主，是曰意，离意根一步，便是妄，便非独矣。”

《学言上》：“**中庸之慎独与大学之慎独不同**，中庸从不睹不闻说来，大学从意根说来。”“独是虚位，**从性体看来**，则曰莫见莫显，是思虑未起，鬼神莫知时也。**从心体看来**，则曰十目十手，是思虑既起，吾心独知时也。”

《圣学宗要》：“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，而慎独即尽性之学。”“中庸之教不明，将使学慎独者以把捉意见为工夫，而不觌性天之体。”

**刘宗周于《中庸》一路讲慎独：慎独即尽性；就《大学》一路讲慎独：慎独即诚意。**

独不仅是心体，也是性体。

心不是体万物而不遗的无限精神。

心体——性体。重新拉向性体一端。

为什么要区分意和念？原因也在这里。

**证人**

崇祯四年（1631），刘宗周与陶奭龄共同创立“证人社”，于陶文简公（即陶望龄，号石篑）祠，“证人社”的讲会即“证人会”。讲会的地点并不完全固定，除陶文简公祠外还有古小学、阳明祠等处，其中古小学是最重要的地点，也即后来的“证人书院”。

据刘宗周之子刘汋记述：海内自邹南皋、冯少墟、高景逸三先生卒后，士大夫争以讲学为讳。此道不绝如线，惟先生岿然灵光，久而弥信。家居之暇，门人谋所以寿斯道者。先生于三月三日率同志大会于石篑先生祠，缙绅学士可二百余人，同主事者为石梁先生。石梁，石篑先生之介弟也。初登讲习，**先生首谓学者曰：“此学不讲久矣。文成指出良知二字，直为后人拔去自暴自弃病根。今日开口****第一义，****须信我****辈****人人是个人，人便是圣人之人，圣人人人可做。于此信得及，方是良知眼孔。”因以证人名其社。**

《年谱》云“大约以主静立人极一语为宗”，立人极正是宗周学问所汲汲关怀的。宗周著有《人谱》，更发“谱人之所以为人”之意蕴。

菜有菜谱（做菜的道理），乐有乐谱（作乐的道理），人有人谱（做人的道理）。做人靠不靠谱。

谱，籍录也。（《说文解字》）本义是记载事物类别或系统的书。

《人谱》包括：自序、**人极图**、人极图说、**证人要旨**、纪过格、讼过法、改过说。

人极图、人极图说：本体

证人要旨：从正面讲工夫

纪过格、讼过法、改过说：从反面讲工夫。

人极图说。周敦颐——主静立人极、太极图说。

远离虚无主义，远离功利主义。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之道。

《人谱·自序》

 友人有示予以袁了凡《功过格》者，予读而疑之。了凡自言尝授旨云谷老人，及其一生转移果报，皆取之功过，凿凿不爽。信有之乎？予窃以为病于道也。**子曰：“道不远人。”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今之言道者，高之或沦于虚无，以为语性，而非性也。卑之或出于功利，以为语命，而非命也。非性非命，非人也，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。**

 然二者同出异名，而功利之惑人为甚。老氏以虚言道，佛氏以无言道，其说最高妙，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。乃其意主于了生死，其要归之自私。故太上有《感应篇》，佛氏亦多言因果。大抵从生死起见，而动援虚无以设教，猥云功行，实恣邪妄，与吾儒惠迪从逆之旨霄壤。是虚无之说，正功利之尤者也。

 了凡学儒者也，而笃信因果，辄以身示法，亦不必实有是事。传染至今，遂为度世津梁，则所关于道术晦明之故，有非浅鲜者。予因之有感，特本证人之意，著《人极图说》，以示学者。继之以六事功课，而记过格终焉。言过不言功，以远利也。**总题之曰《人谱》。以为谱人者，莫近于是。学者诚知人之所以为人，而于道亦思过半矣。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，功崇业广，又何疑乎？**友人闻之，亟许可，遂序而传之。

时崇祯甲戌秋八月闰吉 蕺山长者刘宗周书

**刘宗周迂阔？**

弟子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中也记述了崇祯皇帝屡说刘宗周迂阔的事。

《南明史》，顾诚对刘宗周评价很低，认为他守正而不能达变，敢于犯言直谏而阔于事理，律己虽严而于事无补，迂腐偏狭。

刘宗周对引入西洋火器持反对态度。1642年，在一次临门听政的御前会议上，御史杨若侨推荐善于制造火器的汤若望，刘宗周则认为：“臣闻国之大事，以仁义为本，以节制为师，不专恃一火器。近来通不讲人才，不讲兵法，任敌所到即陷，岂无火器？反为敌用。若堂堂中国，止用若望铸炮小器，恃以御敌，岂不贻笑边方。”崇祯皇帝认为火器本来也是中国就有的长技，刘宗周则进一步强调“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”，国家大计还是修法纪，肃人心。

怎么看？

**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**

刘宗周

 良知之教，如日中天。昔人谓：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”然使三千年而后，不复生先生，又谁与取日虞渊，洗光咸池乎？

 盖人皆有是心也，天之所以与我者，本如是。其虚灵不昧，以具众理而应万事，而不能不蔽于物欲之私，学则所以去蔽而已矣。故《大学》首揭“明明德”为复性之本，而其功要之“知止”。又曰：“致知在格物。”致知之知，不离本明；格物之至，祗是知止。即本体即工夫。故孟子遂言“良知”云。

 孔、孟既殁，心学不传，浸淫而为佛、老、荀、杨之说；虽经程、朱诸大儒讲明教正，不遗余力，而其后复束于训诂，转入支离，往往析心与理而二之；求道愈难，而去道愈远，圣学遂为绝德。于是先生特本程、朱之说，而求之以直接孔、孟之传，曰“致良知”，可谓良工苦心。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即圣人之心，吾心之知则圣人之无不知，而作圣之功初非有加于此心、此知之毫末也。则先生恢复本心之功，岂在孟子道性善后欤？

 《传习录》一书，得于门人之所睹记语。语三字，符也。学者亦既家传而户诵之。以迄于今，百有余年，宗风渐替。宗周妄不自揣，窃尝掇拾绪言，日与乡之学先生之道者，群居而讲求之，亦既有年所矣。

裔孙士美，锐志绳武，爰取旧本，稍为订正，而以亲经先生裁定者四卷为《正录》。先生没后，钱洪甫增入一卷为《附录》，重梓之，以惠吾党，且以请于余曰：“良知之说，以救宋人之训诂，亦因病立方耳。及其弊也，往往看良知太见成，用良知太活变；高者玄虚，卑者诞妄。其病反甚于训诂，则前辈已开此逗漏。《附录》一卷，僭有删削，如苏、张得良知妙用等语，讵可重令后人见乎？总之，不执方而善用药，期于中病而止，惟吾子有赐言。”余闻其说而韪之，果若所云，即请药之以先生之教。

 盖先生所病于宋人者，以其求理于心之外也。故先生言理曰天理，一则曰天理，再则曰存天理而遏人欲，且累言之而不足，实为此篇真骨脉。而后之言良知者，或指理为障，几欲求心于理之外矣。夫既求心于理之外，则见成活变之弊，亦将何所不至乎。夫良知本是见成，而先生自谓“从万死中得来”，何也？亦本是变动不居，而先生云“能戒慎恐惧者”，是又何也？先生盖曰“吾学以存天理而遏人欲”云尔，故又曰“良知即天理”。其于学者直下顶门处，可为深切著明。程伯子曰：“吾学虽有所受，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。”至朱子解“至善”，亦云：“尽乎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。”先生于此亟首肯。则先生之言，固孔、孟之言，程、朱之言也。而一时株守旧闻者，骤诋之曰“禅”。后人因其禅也，而禅之转借先生立帜。自此大道中分门别户，反成燕越。而至于人禽之几，辄喜混作一团，不容分疏，以为良知中本无一切对待。由其说，将不率天下而禽兽，食人不已。甚矣。先生之不幸也。

斯编出，而吾党之学先生者，当不难晓然自得其心，以求进于圣人之道。果非异端曲学之可几，则道术亦终归于一，而先生之教所谓亘万古而尝新也。遂书之简末，并以告之同志。愧斤斤不脱训诂之见，有负先生苦心，姑藉手为就正有道地云。